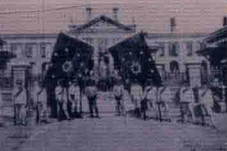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革命与媒介

辛亥首义的报刊动员及报道



Revolution and Media
The Research on Newspaper Mobilization and
Reports of 1911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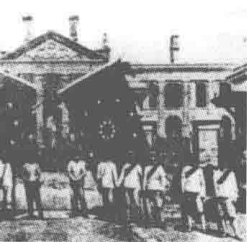
丁苗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革命与媒介

辛亥首义的报刊动员及报道

Revolution and Media
The Research on Newspaper Mobilization and
Reports of 1911 Revolution

丁苗苗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媒介：辛亥首义的报刊动员及报道/丁苗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2

ISBN 978 - 7 - 5426 - 5323 - 9

I. ①革… II. ①丁… III. ①辛亥革命—报刊—新闻事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257. 07②G219. 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6850 号

革命与媒介——辛亥首义的报刊动员及报道

著 者 / 丁苗苗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9.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323 - 9/K · 337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目 录

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1
第一节 革命报刊的创办与演进 / 2	
一、革命报刊兴起的政治背景 / 3	
二、甲午后维新报刊的鼓吹 / 8	
三、革命报刊的演进态势 / 13	
第二节 革命报刊的内容与影响 / 17	
一、宣传亡国危机 / 18	
二、宣传民族主义 / 21	
三、宣传反满 / 23	
四、宣传新知启蒙 / 27	
五、革命宣传影响 / 30	
第三节 革命宣传的方法与特色 / 34	
一、不入空泛,重视事实 / 34	
二、强化和煽动感情 / 37	
三、简化问题和压缩理论 / 42	
四、西学学说和传统文化的嫁接混合 / 48	
第二章 武汉地区的革命培育	53
第一节 武汉地区的媒介土壤 / 53	
一、近代化城市武汉的崛起 / 54	
二、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 / 56	

三、张之洞治下的媒介环境 / 59

四、武汉革命报刊的创办 / 66

第二节 湖北革命组织的沿革与宣传 / 71

一、武昌花园会——“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 / 72

二、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武昌革命之源泉” / 73

三、共进会——“和反满感兴趣的任何人共同前进” / 77

四、文学社——“湖北革命团体的总集成者” / 80

五、对湖北革命团体革命宣传的总结 / 82

第三节 《大江报》案——首义的导火索 / 84

一、吴一狗事件和《大江白话报》 / 85

二、《大江报》的两篇评论 / 87

三、《大江报》案的相关报道 / 88

四、《大江报》查封后的社会影响 / 93

第四节 自强新军与革命宣传 / 96

一、新军接受革命宣传的内在因素 / 98

二、革命党人对新军的宣传 / 102

三、首义爆发前的危机传播 / 106

第三章 武汉报纸的首义反应 112

第一节 《大汉报》——革命舆论急先锋 / 112

一、《大汉报》介绍 / 113

二、《大汉报》的内容和影响 / 115

三、《大汉报》之评价与分析 / 126

第二节 《中华民国公报》——革命政府的喉舌 / 136

一、《公报》介绍 / 137

二、《中华民国公报》的言论和报道 / 141

三、《公报》的变化与结局 / 150

第三节 别样的革命叙事——外人视野下的首义 / 156

一、《汉口日报》的首义报道 / 157

二、丁格尔、莫理循等外国记者与首义 / 169

第四章 外省报纸的首义报道 179

第一节 革命的渐近与游离——《申报》对首义的报道 / 179

一、《申报》的首义报道 / 180

二、《申报》首义报道分析 / 189

第二节 党性与新闻性的共赢——《民立报》的革命鼓吹 / 197

一、《民立报》的首义报道 / 198

二、《民立报》首义报道的分析 / 203

第三节 一个时代的终结——《大公报》的革命建构 / 216

一、《大公报》的首义报道 / 217

二、《大公报》首义报道的分析 / 225

第五章 结语 238

第一节 辛亥革命宣传的几个特点 / 238

一、拟态环境与现实土壤 / 238

二、革命动员与排满宗教 / 240

三、建构与报道的多音部 / 243

四、谣言传播与现实建构 / 245

第二节 革命对新闻业的影响 / 247

一、新闻时代的到来 / 248

二、报纸的纷纭而现 / 253

三、评论业务的变化 / 257

四、新闻图片的普遍使用 / 262

五、新闻认识的深化 / 264

六、国际新闻对华力量的改变 / 268

附文：《辛亥革命重要历史人物的媒介镜像分析

——以袁世凯为例》 271

参考文献 289

致谢 302

后记 304

第一章 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响葬送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启创中华民国这一亚洲第一共和国。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历来见仁见智。就推翻满清政府而言,这次革命无疑是成功的,但就终结专制、建立民主政府与改良社会而论,这场革命无疑又令人充满了遗憾。

考察辛亥革命的成功,媒介的鼓吹浸染素被强调:“辛亥年冬,东人观战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论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论在人,不容为讳。”^①革命党首领孙中山推崇报刊鼓吹之功:“此次革命推倒满清,固然有赖军人们的力量,但是海内外人心一致,则是各报馆宣传之功劳。”^②保皇派领袖梁启超认为:“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

① 《张謇致孙毓筠、王铁珊函稿》,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8页。

② 孙中山:《孙中山先生论务须一致》,《总理全书》演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印行,第74页。

代红血革命焉可也。”^①革命的行动离不开革命的鼓吹,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唤起民众,舆论势力与军队势力相辅而行才能成功。

就辛亥革命的失败而论,亦不乏论者从舆论宣传中寻找缘由。辛亥老人吴玉章曾说:“资产阶级利用了广大人民反对清朝统治的情绪来鼓吹革命,这是对的,不过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认识同一般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宣传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点:一是反满,二是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作详细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没有系统的介绍。”^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宣传成就了革命,但是也妨碍了革命。晚清不乏缤纷并起诸种思潮,亦燃起火热的意识形态争论,但排满的声音最终占了上风成就了这场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著名革命。革命风潮“一日千丈”的发展“实报纸鼓吹之力”。考察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有必要考察革命舆论的政治社会背景,探索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媒介培育情况。

第一节 革命报刊的创办与演进

在中国近代史上,189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清王朝被“东夷小岛”日本所打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东亚盟主的地位完全丧失。由于败给了一衣带水、同为黄种的“蕞尔小国”日本,

①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于《庸言》第1卷第1期。此文亦是10月22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记录稿《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之演说词》,录于《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 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页。

天朝上国失败和屈辱的震撼格外的强烈。“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①日本的胜利从反面论证了变法的合理性，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洋务运动“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②的同时，开始在惊心动魄的危机面前反思传统体制和文化的不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告别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格局，通过近代报刊关注国事，表达政见。

一、革命报刊兴起的政治背景

清朝晚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加剧了经济的衰败与贫困，且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昏聩和软弱无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外态度让人们认识到清廷成了“洋人的守土长官”，这使得许多国人为之齿冷心寒。孙中山回顾：“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指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志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③政府的腐败软弱给革命报刊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的期间，即由日清战争到共和建设的期间，是中国报纸的黄金时代。本来报纸是发表言论从事自由而公平的报道的机关，这是报纸的最高规范。然而一九一一年以后的现代，这种规范显示出退步的倾向。从物质方面而言，那时报纸在印刷和贩卖上，都有相当的进步，然而，那不能算是最高的基准。现代报纸的退步，包含着这样一个真理的矛盾，即政府越有力量，报纸就越衰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② 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序》，自强学斋治平十议版。

③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页。

弱；政府一衰弱，报纸就越有力量。换言之，一方面肥，他方面就瘦。在这一点上，表现着中国政府与报纸之间的微妙关系。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报纸，因为清廷政府脆弱无力，已濒于没落，所以能够完成了许多真正有效的事业，等到共和政府成立，势力渐强时，中国的报纸已先去自由公平的精神、而不成其为民众的报道教育机构了。”^①且不管管翼贤立论是否有偏颇，有一点他说的极有见地，即政府和报纸之间呈现反比例关系。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塌了清廷的威严以及报禁，近代报纸作为先进的传播工具无疑扩大了言说空间，而这言说空间的扩大，自然的给革命报纸的生存与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时期的《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曾在日本的《清议报》被誉为“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飙毒雾之中”的“日报矫矫者”，当时商办各报不断刊出各种关于清廷逃离北京后的消息，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等内容，虽然这些无关大局，却已经把清廷“天朝尊严”撕了个粉碎。清廷的威严在上海报刊上已不再存在，对清廷及皇室的信任、信用、信仰等在不同程度上开始纷纷破产，清廷统治在人们思想中开始出现裂痕，并且通过近代报刊的传达，这种撕裂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大。^②“沿海各商埠的近代华文报刊，已不同程度地发展到对慈禧政权持非议的态度，在上海不仅政论报刊，也包括商办各报馆，华人主笔骂官场已渐成风气。”^③引领舆论风潮的上海报界在 20 世纪初期已经破除了对官场的迷信，继之而来的拒俄运动又给革命舆论的生化养成提供了机遇。

癸卯(1903)年被看作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的一些运动促进了革命思潮在国内的生发蔓延。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侵入我国东北，1902 年 4 月同清政府定约，俄军将于 18 个月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报史篇》，载于《民国丛书》第四编(46)，上海：上海书店，1992 年版，第 48 页。

②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8—209 页。

③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5 页。

内陆续从中国土地上撤走。1903年撤兵日期将至,沙俄仍不从东北撤兵,还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4月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集会张园,指斥沙俄及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政府。东京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集会通电,抗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对俄作战,并自动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开赴东北与侵略军决一死战。与此同时,北京、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成立爱国组织。但软弱的清政府对俄国的无礼要求采取妥协政策,阻挠压制民间的拒俄爱国运动,并污蔑学生“托名拒俄以谋革命”,出重手镇压爱国学生。这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看清了清政府不可救药的反动本质,由爱国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夏间拒俄运动的发生,是推动此后革命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扩大和加深了知识界对满清的不满情绪和反抗态度。”^①“革命其可免乎”成了报国无门学生们的共识,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相应而生。

不满与反抗的社会心理投射在媒介上表现为革命报刊大量出现。是年陈天华的《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标志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正式形成的几篇代表著作纷纷问世;同一年,在日本各省的留学生会所办报纸以不言革命为耻,留学生刊物变成了宣传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这一年,陈范的《苏报》在章士钊的主持下革命色彩日益浓郁,激烈的言词超出清政府所能忍受的极限,清廷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不断向租界工部局交涉,从而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苏报事件,暴露出满清政府的脆弱无能。他们知道像这样怒涛般的叛乱一起,是无法抑止的。在日本发行的言论机关,势力渐大,像洪水一样浸入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这种意识之下,所谓‘笔比剑强’的话是很正确的。孙中山和日本精锐的革命战士,对于醉心革命的留日学生不断举行热烈的言说,他们宣传的思想,于不知不觉中被带到中国来,唤起极大的反响。大势已是如此,

①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地方官吏如无朝廷直接命令,则对于报纸上的政治批判概不过问。北京政府虽然照旧禁止出版物的发卖、禁止学生在报纸上投稿、作报纸的编辑或通信员,然而命令尽管颁布,而效力已等于零了。”^①

第二个关键年份是 1905 年。是年五大臣出国考察,慈禧出于“而在外革命党亦可消灭”、“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②的考虑同意实施新政改革。清廷进行了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建立新军、废除科举等一系列的改革。这虽是促进中国转向近代化发展的良药,但是对于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来说确实也是一剂要命的猛药——新政是在内部造反、外强紧逼的压力下被迫的举动,且由着意于加强皇权和维护满族的旧人物来推行,于是这样的新政改革不可能真正维新,反而在全国所有阶层中都制造着不满:最下层的劳动人民无法理解和忍受政府推行西方的文化,也不愿接受推行新政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一般性知识分子由于科举制度废止断了他们上升到更高阶层的出路,大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反生出对政府的异心;对于资产阶级和立宪派来说,政府的改革力度和改革方向与他们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距离,落差与失望不免产生。鼓吹改革的报纸也承认改革后的局势危于昔日。如《鄂报》云:“夫自改革新政以后,士民之涉猎文明者,则互相鼓励,互相激发,思以抵毁政府,排斥外人。悲往事,则如泣如诉;谈新政,则如羨如慕,是故可想见我国民之开化之一斑。然一涉于激烈,则貽祸莫深,如毁教堂、谈革命,无一不震动全局,而耗国家之钱财,涂国民之肝胆。庚子以前无论矣,即如近日南昌教案、萍乡乱党,皆事涉卤莽,不计今日之势而熟筹者也。”“附新党者涉于暴,而屡起仓促之变;附于旧党者则涉于懦,而别无进取之心。考其形状,则今日之势胜于昔日;察其实病,则今日之势更危于昔日。

① 管翼贤:《新闻学集成·报史篇》,载于《民国丛书》第四编(46),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0页。

② 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引自《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有识者即此以预卜前途之影响，应滋惧矣。”^①

1909年是关乎清廷命运的最后一个关键年份。帝后皆崩后的王朝大权掌握在满清新贵手中，他们急于揽权与排汉，促使新政走向了维新的反面：“工业方面收回权利的运动，在一片经济萧条的现实中凋谢；收回铁路权利运动，在清廷路权国有和大举外债中夭折；预备立宪的美梦收获了满人以半数优势胜出的皇族内阁果实，新政在地方的实施催生出赋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噩梦。”清政府将亡的信念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蔓延，甚至影响到改良派及一些奉行改良的官吏。如谭延闿的顾问描述人心转变：“自是人心愈愤，仇视清吏若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其革命潮流，竟成为一般人民之普遍心理矣。是时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辛亥俱乐部纷起，虽未奢谈排革，窃见清室贵胄专横日甚，则亦愿革命之早成。盖从前持此义者，在上流人物不过少数，至是官吏者亦复乐为之。革命党人乃不啻得一大协会。清祀不绝，其在是乎？其在是乎？”^②这种矛盾在张謇后来的笔墨中也能得到验证：“辛亥年冬，东人观战者云，是以口舌革命；西人论政者云，是以心理革命。公论在人，不容为讳。且彼时人民之倾脂竭髓，饷军费械，奔走响应，绝不反顾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希兵祸之速解。所谓革新者，昔之吏贪者革而廉，兵纵者革而敛，商困者革而纾，民伦者革而奋，实业革而兴，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财政革而理。”^③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④痛苦确实已经减轻，但民众对痛苦的感觉却更加敏锐，“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并非总是因为人民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人民最初对暴虐的统治保持

① 《鄂报》，1907年1月18日。

②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2—203页。

③ 《张謇致孙毓筠、王铁珊函稿》，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8页。

④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沉默,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这种统治的不合理之处;但是当暴虐统治的压力一旦减少的时候,他们就会猛力推翻这种统治。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比它之前的政府制度有所改善。”在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中推行改革绝对有风险的事情。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清政府统治的危机随着改革的进行而日益加深。对于清政府来说危机四伏的环境为革命宣传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像《大公报》后来说的那样,政府简直是在给革命党制造宣传所需要的事实材料。全国形势有如布满火种的干柴,随时可能被革命派点燃为燎原的大火。

二、甲午后维新报刊的鼓吹

太平天国的反清暴动需要舆论的准备,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辛亥革命更需要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动员。就全国范围来说,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工作更多是由倾向改良维新的报刊来推动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兼用。”革命派武器的批判的实践和改良派批判的武器的磨砺相互配合,共同唤起了革命。

从 1895 年到 1898 年,维新人士创办了 40 余种刊物,初步建立鼓吹维新思潮的舆论阵地。“变”是那个时代舆论的最强音,严复断言“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①梁启超更是满怀自信和激情的向大众呐喊:“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②1895 年 3 月,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原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等观点刺激着长期在历史循环论里踟躅盘桓的莘莘士子,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连载了 21 期的《变法通议》,宣传

① 严复:《救亡决论》,卢云昆选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44 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0 页。

“开学校”、“废科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①等思想主张；汪康年也在《中国自强策》中提出“复民权”、“开议院”的自强对策，“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②严复在《辟韩》里尖锐的指出，“秦以来之为君”都是“大盗窃国者”，民才是天下的“真主”，只有“去其害富其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③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维新刊物译西学，广新知，煽动风潮，鼓吹变革，将西方民主政治观念大量介绍入国，为国人提供了一套新的价值参照体系。时人道：“新学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之间，中国人士之识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从前自尊自大大居于中国而鄙人为夷狄之心，多有悔其非者，先觉之士，慨世之徒，攘臂抗论大声疾呼所在多有。”^④

维新派不遗余力地进行新知推广的工作。1987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创办，译介了《俄土战纪》、《意大利兴国侠士传》、《瑞士变政记》等书。后还编纂了《西学书目表》和《日本书目志》等工具书指导国人阅读，推动西学在中国的普及。费正清对此总结道：“在1840年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明显。……中国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学仅有的一点兴趣大部分集中在技术知识上，但在该世纪末，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已转向西学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以及西方宗教思想等方面了。”^⑤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

② 《时务报》，1986年9月7日。

③ 《时务报》，1987年4月12日。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⑤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317页。

维新派办报纸、译西书,从“开民智”、“新民德”的角度出发,大力宣传改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并创办了诸如时务学堂一类的新式学堂。其中维新报刊输入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所必需的精神养料,提供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发展的空间,造成了传统社会阶层的分化,哺育了新一代知识人,这些人日后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此外,维新宣传对封建专制制度开始了理论上的批判,这一批判影响深远,后来与革命派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导致了中国封建专制政府的崩溃。就此而言,维新报刊是政治革命的一原动力。

维新思想的宣传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戊戌癸卯间的宣传要比戊戌前的维新宣传更加深入和广泛。以译书为例,“壬寅(1902)、癸卯(1903)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①留日学生组织译书汇编社,“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国内上海各书局“竟出新籍,如雨后春笋”。“欧西巨子之学说”乃得以“滔滔焉渡重洋,竞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这一时期,维新人士把西方各时期、各流派的文化意识形态,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到当时最时髦的帝国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都介绍进来。华文报纸到辛亥前后更猛增到 500 余种,连同陆续停刊者,共有 700—800 种之多。^② 这些报刊多崇尚启蒙、鼓吹变法,论说国家大事,输入西方文明。用当时的话即“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③这标志着戊戌癸卯年间的维新思潮不断普及与深化。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36 年版,第 71 页。

② 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引自《辛亥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 523 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3、52 页。